

中国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研究述评

曾祥炎 林木西*

摘要: 中国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产权制度的渐进及增量改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产权制度的渐进及增量改革影响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增进了经济绩效;二是产权制度的“真实”保护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一种替代性的制度,使中国要素主体的产权得到了“真实”的保护,从而客观上增进了经济绩效;三是产权制度的“非均衡”保护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政府对要素主体的产权进行“非均衡”保护才是增进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这三个视角在逻辑上有一个由微观向宏观扩展的过程。本文认为,第三个视角更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因为中国的实践证明,在经济“起飞”阶段,产权保护的“非均衡”比产权保护本身更为重要。

关键词: 产权制度 “真实”保护 “非均衡”保护 经济绩效

运用西方现代产权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容易产生“悖论”。因为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在法治、产权保护等方面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法律体系还比较薄弱,法官群体中的一部分并没有受到良好的训练(Clarke, 1996),在契约的执行方面也没有完善的法治作为保障,并且直到 2004 年,中国才首次将保护私人财产权写入宪法,在产权界定与保护方面中国甚至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La Porta, et al., 1998)。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却保持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这种高速增长正在持续下去。这对于那些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认为任何违背私有产权制度的行为必定会损害社会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这一“悖论”的产生主要根源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倾向于微观与效率分析的传统,将产权和政府处理为两个独立的要素,从而弱化了产权理论在解释诸如中国“强政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能力。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强政府”与产权制度二者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不仅在微观上通过产权制度改进对生产要素主体形成激励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率配置,而且在宏观上通过构建各生产要素之间的产权利益关系进而影响生产要素实际投入并最终决定经济增长。基于这一原因,本文遵循由微观向宏观扩展的思路,对中国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述评,以求较全面地理解产权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微观分析视角:产权制度的渐进及增量改革与经济绩效

中国产权制度有着明显的渐进与增量改革特征。产权制度改革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开始,逐步转向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通过产权制度的渐进及增量改革影响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而影响了经济绩效。

其一是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众多研究文献论证了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底,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增长效果。McMillan、Whalley 和 Zhu(1989) 等的研究表明,1978 - 1984 年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约 78% 归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

* 曾祥炎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邮政编码: 411201 电子信箱: yangyan9408@ 163. com; 林木西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110036。

本文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基于宏观产权制度分析框架的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第一章基础上作较大修改而成。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施。林毅夫(1994)利用1980-1984年的数据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认为这一时期有超过60%的农业生产增长主要是由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造成的。Jacoby、Li和Rozelle(2002)通过应用中国农村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也确认了保障产权对中国农户土地利用以及农业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李永友和沈坤荣(2009)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1979-1984年间达到40.05%。

其二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历了从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到下放所有权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在经历产权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显著改善。Phillips和Shen(2005)通过构建包含国有经济份额等因素的回归模型发现,国有企业比重和区域经济增长率呈强负相关,国有经济所占份额下降10个百分点,第二年的实际GDP增长0.7%~1.2%。葛扬(2007)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样本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发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产权制度的变迁是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是该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另外一些研究则试图回答民营化后国有企业绩效是否得到改进。Dong等(2004)应用南京及其周边的168个乡镇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适当引进民营产权在大多数绩效指标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高。Wei、Varela和Hassan(2002)选取中国1036家不同所有制企业做绩效差异评估,得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于非国有企业的结论。胡一帆、宋敏和张俊喜(2006)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五个城市、覆盖六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尤其是提高了销售收入,降低了企业成本,并最终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且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其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民营经济被普遍认为是比国有经济更有效率的经济形式。刘小玄(2000)以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时发现,由于明晰的产权结构和稳定的产权关系,民营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姚洋(1998)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与国有工业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出57%。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的兴起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许小年和肖倩(2003)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来自民营经济,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就难以取得持续的高增长。冯燮刚(2004)证实了在1998-2003年期间,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在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总额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53%,增加了10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国有经济。

其四是外资经济的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Kueh(1992)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时发现,外商投资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工业生产商和出口商。罗长远(2006)研究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资本形成存在“挤入效应”,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刘博(2011)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并根据1985-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GDP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中国经济增长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显著影响的结论。魏后凯(2002)在分析地区差距时发现,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

由于现代产权理论倾向于微观与效率分析,因而从产权制度的渐进及增量改革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比较顺理成章。但这一视角的研究无法说明,在缺乏明确的正式财产权利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说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到底在哪里。

二、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分析视角:产权制度的“真实”保护与经济绩效

既然产权制度的渐进及增量改革不足以解释中国缺乏正式产权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于是学者们开始通过探讨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寻找是否存在一种替代性的制度,使中国要素主体的产权得到“真实”的保护。Dixit(2004)的分析证明,在缺乏正式制度的情况下,社会可能试图以一种现存的制度进行替代以保护他们的经济活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Rodrik(2008)认为法律制度本身其实对经济增长来说并不至关重要,真正关键的是投资者的产权是否受到了“真实”的保护。通过对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比较发现,尽管俄罗斯有着良好的法律意义上的产权制度而中国却没有,但结果却是中国维持了高速的贸易增长而不是俄罗斯,由此推断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往往与地方政府分享了利润(sharing of profits),从而确保业主不会因为拥有产权而失去对企业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分析,Rodrik通过探究中国法律上(de jure)和事实上(de facto)的产权制度差异,证明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钱颖一和 Roland(1998) 基于软预算约束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财政分权加上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以推动地方政府竞争,增加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救助成本,财政竞争成为阻止政府无效支出的一种承诺工具,从而硬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上述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Lin and Liu,1999;等等)。

还有一些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化。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超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地方国有企业的产权和极为稀缺的土地资源供应,同时也是行政资源的垄断者——批准投资许可以及掌握投资的优惠政策,甚至能帮助投资者得到金融支持。在政府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总是试图采取与企业“合作”甚至以“经营”企业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其结果是使投资者得到了“真实”的产权利益保护。具体说来主要有:

首先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Nee(1992)论证了企业混合型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在中国政治权力和市场机制并存的转型经济中,混合型产权的企业“是试图克服在微弱的市场结构和不完全的市场转型情况下产生的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在竞争中具有优势。李稻葵(1995)提出了“模糊”产权的概念,认为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许多交易具有潜在的非法性和巨大的交易成本,地方政府的参与对许多非国有企业而言是有效率的的生产行为,企业通过使政府成为自己的合伙人,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好处,正是这种“模糊”产权为企业提供了较好的保护机制。但是,尽管“模糊”产权理论可以解释改革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却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的逐渐式微,以及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周雪光(2005)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象征性产权”在改革之初的重要作用。例如:在改革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争相“戴红帽子”——冠以集体企业之名,或者挂靠在某个政府机构之下。这些政府机构虽在企业运作中并未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但这种产权结构中所表现的关系纽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即建立了企业与环境的一种特殊关系,为组织存在和运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产权得到了“事实上”的保护。单豪杰和沈坤荣(2008)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总是偏好于通过税收和土地优惠等各种形式进行招商引资,通过鼓励私人经济活动为经济市场化发展“助力”,由此促进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协调。这种利益协调让中国政府的改革承诺更具可信性,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情况下,为中国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事实上的私人保护,这种保护的基础虽然不是来自法治因素,而是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和经济分权的激励,却对企业伸出了一只“扶持之手”。

其次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戴慕珍(1992)在对财政改革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理论,认为财政体制改革极大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农业的非集体化使发展工业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首选,这种制度激励因素促使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Walder(1995)、Oi和Walder(1999)通过分析转型前期的企业运作对私有制可以促进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竞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强调地方政府在当地集体企业运行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政府即厂商”的说法,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仿佛扮演一个企业集团总部的角色,财政改革使得基层政府的财政激励尤为强烈,而且行政层次越接近基层,政府的目标和利益与地方企业越一致,而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控制职能也同时大大增强,从而在实际上使这些企业产权有着很大的明晰度,为提高“监督”效益提供了激励,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发展。杨瑞龙(1998)认为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从而为企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沈坤荣(1998)也认为正是地方政府充当企业家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现行的产权制度在许多方面的运行都与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模式相去甚远,现实中的产权常常是模糊的和象征性的,而且可能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界定(张静,2003;张小军,2004)。所以,从产权制度的“真实”保护程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然而,这一理论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种“事实上的”产权制度能够使中国经济表现得比那些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产权制度都运行良好的国家还要好。

三、宏观分析视角:产权制度的“非均衡”保护与经济绩效

由于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初始动力,但并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于是,一些学者试图探讨地方政府竞争背后的产权制度关系。黄少安和王怀震(2003)、Acemoglu等(2005)认为,一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均衡依赖于特定的信息结构、当事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制度再分配效应。Border和Segal(1997)相信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不对等经济关系、不对称经济资源和制度再分配效应,决定了制度安排和

现实制度均衡的多重性,也决定了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独特性。Zhang Xiaobo 和 Zhang Kevin H. (2004) 发现,发达国家中尽管相关文献没有进行详细的划分,实际上产权安全包括投资者和个人的权利两个方面,而在中国两种类型的财产权利所获得的安全程度是不相同的,资本投资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受到了有效的保护,个人的权利包括工人的权利和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只有较为松散的界定,这是中国产权制度一个独有的特点。魏建(2010) 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产权保护方式——选择性保护,即对投资进行强力保护,而对土地、劳动力进行较弱保护以配合经济增长的需要,其中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特点被许多学者在实证分析中所证实。程保平(2006) 以建筑市场中农民工私人产权为例,发现农民工的私人产权不只是遭受雇主(或企业)侵害,同时还遭受着政府(地方政府)的侵害,在双层失衡性产权结构下,地方政府既是侵权者又是雇主实施侵权的支持者。这种现行的产权制度向雇主提供了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有利可图的“共同知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雇主便由此在侵害农民工私人产权问题上达成了合谋条款,分别实施这种合谋条款表现为每一雇主在其与农民工事实上签订的雇佣工资支付契约中含有谈判地位不对称、“裸体工资”和拖欠支付等三大侵权条款,因而要从根本上阻止拖欠行为,维护农民工的各种权益,最好的选择在于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王永钦和李明(2008) 从互联合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现在市场缺失和不完善的情况下,互联性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在转型初期,由于信贷、保险、土地、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备和对私人产权保护的不力,无论在农村部门、城市部门,还是在城乡之间,也无论在家庭层面、社区层面还是企业家与政府之间,都出现了一系列替代性的合作关系和制度安排,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缓解了市场化的“阵痛”和转型的成本,并促成了中国“增长奇迹”的出现。张幼文(2008) 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资源“扭曲”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这些扭曲包括环境破坏的生产外部性、资源价格偏低的生产扭曲,土地协议转让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和外资偏低税负等的要素扭曲,以及由汇率低估和出口激励政策所导致的对外扭曲等,这些扭曲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寻租行为导致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靳涛(2008)、李永友和沈坤荣(2009) 等从地租扭曲中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认为地方政府对地方工业地价的人为压低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投资在该地区的增加,因为降低地租率来达到引资增加的竞争行为实际上使得投资者获得了超额利润,在政治集权和风险大锅饭体制下,这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生成与强化的根源。

其实从产权的“非均衡”保护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并不唯一出现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过程中。张宇燕和高程(2004) 在研究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中也发现,工业革命之所以出现于西方,主要是因为新制度有效地、歧视性地保护了具有生产性的商人集团的财产权利,由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国家是否对“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作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产权进行“非均衡”的保护,是一国能否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信的,受到“非均衡”保护的产权制度分布结构是否高于产权保护本身。

四、简单评述

综合分析,中国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的三个视角在逻辑上有一个由微观向宏观扩展的过程:产权制度的渐进及增量改革视角遵循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倾向于微观与效率分析的传统;产权制度的“真实”保护视角在分析是否存在一种替代性制度使资本的产权利益受到“事实上”保护的同时,探讨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资本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涉及宏观分析方法;产权制度的“非均衡”保护视角客观上分析了在各种生产要素的不同稀缺程度下,由于利益分配关系引致的产权“非均衡”保护会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实际上会有多少被投入于各生产部门的问题,也就是会不会出现生产资源被“闲置”未用的情况及其原因,因而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现代产权理论的微观与效率分析出现“产权效率悖论”,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无法解释东亚模式的成功和拉美模式的效果不明显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完全失败。特别是俄罗斯、印度等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比较彻底的国家,其产权制度相对中国而言正式程度较高,但俄罗斯、印度民间投资低迷,中国民间投资旺盛。如果不是产权制度的正式程度,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产权制度的产出效率?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首先弄清正式产权和法律制度所需要的交易成本。Coase(1960) 坚持认为,如果产权得以明确界定并且交易成本为零,则人们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有效地解决经济纠纷。然而在现实中,谈判总要涉及交易费用有时甚至是高昂的费用。例如,在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像经合组织国家和印度,往往需要年复一年的协商才能使不同利益集团就某块土地的使用达成一项协议。即使对于新德里申请主办

2016 年奥运会这样的大事,政府要想获得土地也是一项“马拉松式的任务”,因此长期谈判阻碍了公共投资和企业投资的进程。

在一个西方民主制国家,各种利益集团形成相互制衡机制。一些大的决定如土地的采购等,必须经过长期谈判,并举行有关利益集团的听证会。Olson(1982)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可能会阻碍社会的变革,因为有些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地阻止和延长任何重大改变,即使这种变化可能有利于整个社会,而利益集团的目标是力图在现有的社会产出中分得更大的一杯羹,而不仅是经济的增长。利益集团的膨胀和分化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Acemoglu(2003)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由于缺乏承诺而导致实现科斯意义上的谈判解决是极为困难的,因而良好的产权运行需要高昂的成本。

与产权制度运行良好并且法律制度健全的民主制度相比,威权主义作出的决定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更能体现公众利益^①从而带来经济增长的便利,因为威权主义更容易做出重大决策,减少民主制度下为平衡各利益集团之间冲突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威权很可能会创造一个更方便的工商业投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仅源于事实上的产权制度,更源于非常有利的投资环境,而这种投资环境主要是通过政府产权的“非均衡”保护实现的。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和中国经济差不多,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印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提供了这种有利的投资环境。

这种环境下政府所推动的产权改革可能具有奥尔森(Olson,1982,2000)所说的“包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如果随着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社会投资规模扩大,投资效率能够提高,政府的税基得以扩大,政府收入随之增长,这时政府和社会就具有了“包容利益”,此时的产权制度变革往往是有效的。

但是,这种依赖政府对产权制度进行“非均衡”保护取得的经济成功,相对来说只能在社会“起飞”阶段才能实现,因为这一阶段有保证资本产权利益从而促使资本形成的强烈需要。但当一个经济体一旦跨过这一阶段,如果继续一味地坚持对资本利益的过度保护,则会引起劳动、土地、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产权所有者的抵制,从而引发更大的经济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健全和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正是目前困扰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也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程保平 2006《产权制度、合谋条款及国家成功——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以建筑市场为例)的契约理论再解释》,《经济评论》第 3 期,第 25—35 页。
2. 冯燮刚 2004《完善资本和土地配置市场化推动中国经济第三轮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第 3 期,第 5—10 页。
3. 葛扬 2007《论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持续增长——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经济纵横》第 11 期,第 7—10 页。
4. 胡一帆、宋敏、张俊喜 2006《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经济研究》第 7 期,第 49—60 页。
5. 黄少安、王怀震 2003《从潜产权到产权:一种产权起源假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8 期,第 13—16 页。
6. 靳涛 2008《引资竞争、地租扭曲与地方政府行为——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不和谐”分析》,《学术月刊》第 3 期,第 83—88 页。
7. 李稻葵 1995《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第 4 期,第 42—50 页。
8. 李永友、沈坤荣 2009《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成因与强化》,《学术月刊》第 2 期,第 72—80 页。
9. 林毅夫 1994《90 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问题与展望》,《管理世界》第 3 期,第 139—144 页。
10. 刘博 2011《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第 2 期,第 10—14 页。
11. 刘小玄 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2 期,第 17—25 页。
12. 罗长远 2006《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 4 期,第 27—43 页。
13. 单豪杰、沈坤荣 2008《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个激励导向的分析》,《经济评论》第 1 期,第 20—28 页。
14. 沈坤荣 1998《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 2 期,第 22—30 页。
15. 王永钦、李明 2008《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互联合约的视角》,《管理世界》第 10 期,第 5—20 页。
16. 魏后凯 2002《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4 期,第 19—26 页。
17. 魏建 2010《产权的选择性保护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政法论坛》第 1 期,第 19—26 页。
18. 许小年、肖倩 2003《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将来自民营经济》,《经济界》第 3 期,第 24—27 页。
19. 杨瑞龙 1998《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第 1 期,第 5—12 页。
20. 姚洋 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12 期,第 29—35 页。
21. 张静 2003《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第 113—124 页。
22. 张小军 2004《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第 121—135 页。
23. 张幼文 2008《政策引致性扭曲的评估与消除——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学术月刊》第 1 期,第 60—68 页。
24. 张宇燕、高程 2004《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第 93—110 页。

^①当然,威权主义也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有时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25. 周雪光 2005 《“关系产权”: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31页。
26. Acemoglu, Daron. 2003.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31(4): 620-652.
27.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1,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385-472.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ress.
28. Border, Kim C., and Uzi Segal. 1997. “Preferences over Solutions to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65(1): 1-18.
29. Coase, R.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October): 1-44.
30. Clarke, Donald C. 1996.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ourt System: The Enforcement of Civil Judgments.”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0(1): 1-92.
31. Dixit, Avinash K. 2004. *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 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2. Dong, Xiao-yuan, Louis Putterman, and Belent Unel. 2004. “Privatiz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Comparis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Enterpris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4(3): 608-633.
33. Jacoby, Hanan G., Guo Li, and Scott Rozelle. 2002. “Hazards of Expropriation: Tenure Insecurity an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 1420-1447.
34. Kueh, Y. Y. 1992.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1(September): 637-681.
35.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6): 1113-1155.
36. Lin, Justin Yifu, and Zhiqiang Liu. 199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imeo. Peking University.
37. McMillan J., J. Whalley, and L. Zhu. 1989.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4): 781-807.
38. Nee, Victor.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27.
39. Oi, Jean C. (戴慕珍)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1): 99-126.
40. Oi, Jean C., and Andrew G. Walder. 1999.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1. Olson, M.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2. Olson, M. 2000. *The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43. Phillips, Kerk L., and Kunrong Shen. 2005. “What Effect Does the Size of the State-owned Sector Have on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5(6): 1079-1102.
44. Qian, Yingyi and Gerard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 1143-1162.
45. Rodrik, D. 2008.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Formulating Growth Strategies.” I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ed. J. Stiglitz and N. Serra, 356-38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6. Walder, Andrew G.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263-301.
47. Wei, Z., O. Varela, and K. Hassan. 2002.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12(1): 61-78.
48. Zhang, Xiaobo, and Kevin H. Zhang. 2004. “How Does FDI Affect Regional Inequality with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9(4): 47-6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 Right System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A Review of Literature

Zeng Xiangyan¹ and Lin Muxi²

(1: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Economics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angles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property – right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form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first one believes the incremental and progressing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 right system may affect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us enhanc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second one believes existence of an alternative system formed an “authentic” protection of property – right system for Chinese owners, which objectively enhancing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third angle believes that the “non – balance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 right system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he root caus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se three angles move from a micro view toward a macro view logically. We think that the third angle better explains the “miracle” of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forming becaus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during the “take – off” period of economic growth, “non – balance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 right system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 right system itself.

Key Words: Property – Right System; “Authentic” Protection; “Non – Balanced” Protec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JEL: P30, E02, O17

(责任编辑: 陈永清)